

# 略论王安石教育思想

方国兴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推行教育改革,发展官学,使宋代教育为之一振,为我国古代教育史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 “新故相除”与智愚转化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哲学观的反映。王安石的哲学观突出了一个“变”字。他认为人是可以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可以变的。他指出物质世界发展的顺序是:太极(阴阳二气)生五行(水、火、金、木、土)、五行生万物。自然界是“可视而知,可听而思”的。人凭感官而认识事物,同时“五行”本身在“万物之变”中运动。运动的原因在于对立物互相依存的“两”和“偶”的作用。而“偶中又有偶焉,万物之变逐至无穷”。这便形成了“道”,即对立物之相反相成的运动规律。王安石把这一规律称作“有对”。“善者恶之对,有善则必有恶”;“没者存之对,终者始之对”,“有之与无,难之与易,长之与短”等,皆不免有所“对”,它们“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也”,没有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在此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新故相除”<sup>①</sup>,即新陈代谢的观点。他说:“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sup>②</sup>,道出了自然(天)和社会(人)的共同变化规律。王安石正是从这里出发,排除了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谬说,寻找到变法革新的理论依据,并为其革新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人性论”这一重要课题,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作出答案的。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得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结论。认为决定人的智能是先天的固定素质。司马光站在地主阶级“守成”立场上,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唯心史观,认为“智愚勇怯,贵贱贫富”都是由天命所注定的。王安石则与此相反,他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立场出发,提出了“智愚转化”说,强调了客

观环境和主观努力在教育上的主导作用。他说:“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sup>③</sup>从而否定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观点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相近之性,以习而相远,则习不可以不慎,非谓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他认为“性”本无善恶之分,也就不存在上下之别;人的智与愚,善与恶,是后天“习”的结果。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关于“情”,王安石认为性乃情之本,情是性之用,情、性本是一件事。“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的是性,发于外而见于行的是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物而后动焉”。人的性情是受客观条件所支配的,因而产生了社会等级差别,即所谓“贵贱有常分”,由这一差别又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道德关系:“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sup>④</sup>。强调了环境和社会实践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在他的名篇《伤仲永》中指出伤仲永五岁就能“指物作诗”,自然禀赋确异乎常人,然而十几年后却“泯然众人矣”,这是由于“受于人者不至”,即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和学习的结果。总之,王安石是把人的善、恶、智、愚归结到由后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实践而决定。这就同正统的儒家思想划清了界限并使这一问题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羁绊,而具有了唯物主义因素。《伤仲永》篇也就成了批判“生而知之”的“天才论”的依据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哲学观中突出了一个“变”字,强调了人的作用: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强调“人定胜天”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他强调人为的决定作用(社会实践的作用),在先天禀赋与后天学习上他强调后天学习的作用(环境与教育的作用),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王安石都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将其锋芒对着孔丘以来的“天命论”而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王安石认为促进智愚转化“变”的手段是教育。

他把教育提高到直接服务于政治变革关系到治国安民的高度,因此,在他推行新法的同时,也就着手改革教育,并成为—个改革的教育家。

## 二、改革科举与陶冶人才

王安石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变法人才。在如何培养变法人才这个问题上,他突出了一个“改”字。他在嘉祐三年(1058)《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才难得的原因及慎选人才、陶冶人才的意义、途径与方法。他说:“朝廷急于变法图强,‘其事不能’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培养人才。‘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之焉’。若能如此,‘变更天下之弊法’则‘甚易也’。于是他把陶冶培养一大批能够‘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作为变法的首要问题而提出来。针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卿大夫皆‘苟简贪鄙’之辈的实际情况,王安石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通过考试来严格选拔官吏;二是通过学校来培养大批的新生力量。后者是主旨。他说:‘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王安石在教、养、取、任四个方面的‘道’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所谓‘教’包括广置学校、更新教材、选拔教师、确定方针以培养‘或用于天下国家,或为天下国家所用’的贤才。所谓‘养’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给官吏以相当的物质待遇,绳之以严明赏罚制度,使之安身立命,杜绝贪鄙。所谓‘取’是指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方法。王安石主张人才要由学校来培养,通过举贤、察行、考绩等方式,选拔德才兼备者,在方法上既要广泛征询意见,又不必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所谓‘任’即要求取其—技之长,量才使用,任之必信,并‘久于其职’反对苛刻求全,论资排辈,频繁调动,猜忌如仇。对上述四个方面,王安石强调‘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坏天下之人才’。可见王安石认为欲救国,必需要有人才,而人才之得与否,惟在重视陶冶之道。而陶冶之道惟在努力于教、养、取、任四者,通过这四者培养出能够胜任政治、军事、财政、经济诸方面的人才,改革整个官僚体制,以适应变法革新的需要。

要陶冶人才,必须兴办学校,兴学又必须改革科举,并努力使科学与学校结合起来,这也是王安石“新政”的—个重要方面。他说:“今人才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道德故也。欲—道德则当修

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于是王安石提出了改革科举和兴办学校的办法。

宋代科举取士办法,大体沿隋唐之旧,但宋取进士多至数百人,比唐范围扩大,而且实行“糊名誉录”(类似现今密封试卷和择优录取)。甚至诏劾“滥举之罪”<sup>⑤</sup>,以防止豪门凭特权舞弊。但科举旧习毕竟是“败坏人材”的。“人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科败坏人材”<sup>⑥</sup>。因此,王安石建议“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sup>⑦</sup>。这就是说,取士应从学校,而且必须必变那种鼓励学生钻牛角尖,只记诵那些“雕虫篆刻”的“无补于世”之学,而不注重经书义理的脱离政治变革实行的倾向。神宗熙宁四年(1071)朝廷“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sup>⑧</sup>。王安石为了统—思想“—道德以同天下之俗”,组织编撰了为“新法”找“义理”的新教材—《三经新义》(即诗、书、周礼)作为正宗教材颁布全国,—扫汉儒章句传注式的旧学风。“—时学者无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说,先儒传注,—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sup>⑨</sup>。显示出王安石“新义”、“新学”的气势。

熙宁四年(1071)五月,北宋王朝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又“命诸州置学官,卒给田十顷贍士,并置小学教授”<sup>⑩</sup>。据《南城县志》记载,当时政治遣学官,辟庙宇建军学,还将民间无主之田产收归学校充当经费,于是四方之士,来南城求学者达“数十百人”,其它州县大抵如此。随着学校的兴起,考试内容与方法也大为更新,“于是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sup>⑪</sup>。同年十月创立太学“三舍法”规定了严格的升级制度,经定期考试,择优升舍。始入太学者居“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除官”<sup>⑫</sup>。这就把养士与取士的职能统归于学校,削弱了科举而提高了学校。

王安石的“三舍法”可称创举,具有积极意义:第—,扩大招生面,广泛地收集了各阶层人士,在—定程度上排除了门第之限。规定各舍名额有定,每年太学毕业近百人,作为推行变法的—新生力量。第二,分舍教学,学生程度大抵—致,便于集中讲授和统—要求,使学校制度规格化、标准化,第三,在评定学生成绩方面,太学实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积分制”,还参考学生日常“行、艺”记分,这就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评定

一个学生。三舍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制改革的先声。

北宋历史上有三次兴学运动(范仲淹为相时仁宗庆历四年的兴学,王安石为相时神宗熙宁元丰的兴学和蔡京为相时徽宗崇宁元年的兴学)其中,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改革之烈,成效之著要数第二次为最,这与王安石的革新是分不开的。

### 三、学以致用与“教之有方”

王安石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因时制宜”,从实际出发,突出一个“用”字。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教学内容之虚和教师的教学之迂。教师只会“讲章说句”,“教之以课试文章”。学生“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象这样培养“高分低能”者的教学,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要毁坏良材。因此,他提出了学以致用的原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学而能致用当然主要不是诗赋、贴经、墨义之类,而是礼、乐、刑、政和天文、地理、人事、政理之类。因此,他要求学生和文吏不只是训习句读,懂得文辞,最主要的是学会以经术断议论,参古今以评政体的实际本领。要突破传统的藩篱,注意运用和实效,教以切于实用之学,反对那种讲学章句与课试文章的陈旧封闭型的教育。按照王安石这一观点,在熙宁、元丰兴学中,京师除改革太学外,不设立了许多专科学校,如律学、战学、医学等,以培养有用于“社稷之托,封疆之守”,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各方面的人才。当时在京师的太学和专科学校,除了学《三经新义》和各类专业外,还有天文、历史、算学等科目,甚至于兼修画学和书法等学问。王安石本人就是一个博学多才而注重实践的人。据《鄞县志》记载,王安石早年在鄞县(今宁波市郊)做县令时,“起堤堰,决陂塘,历东西十四里水陆之利”,深入社会调查和考察,足迹遍于东钱湖。他曾自称诸子百家、医药、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用什么方法才能培养出学以致用的人才呢?王安石主张通过教与化两方面来完成。“善教者藏其中,民化上而不知其所以教之源”。在上者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则在下者自然可以潜移默化,验于上,却并不知道自己的修养、学问、技能是来自谁的熏陶。教育如果只止于空泛道理或法令告戒是达不到这一步的。所以他强调“教之有方”。说“善教育者决于民

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决于心,以道强民者也”<sup>⑬</sup>。所谓“扰”是顺着,即因势利导;“强”是挟制,欲强人所难。“决于心”者是不能攻于心的。这种教学方法,自然收不到良好的陶冶效果。因此,王安石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主张:不但“问其口”,还要“传以心”;不但“听以耳”,还得“受以意”,只有这样才能“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否则,“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sup>⑭</sup>。这就是说教学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的是否合理和得当。王安石在说明上述道理的同时,引述了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排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表示赞成孔子启发诱导、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为师者有讲而无应,为弟子者则有读而无问”,那种死板沉闷的教学气氛的原因。他提出并非学生不想发问而是“以经之意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但“无问”,而且又“无思”呢,并非学生不想多思,“以经之意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sup>⑮</sup>。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只能是一知半解或片言只语而已。岂能谈上实际应用?面对这一严重问题,王安石大声疾呼对教师要“严其选”,要选拔、训练、和培养德才兼备、品学双优,并且有实践经验,教学有方的官吏、学者担任教师。

综上所述,王安石强调教育要学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结合,他把学用能否结合提高到“成才”或“毁才”的高度,并结合当时社会实际。举办律学、战学、医学等专科学校,提倡文武并举,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仅为变法培养了人才,而且对当时以知兵为耻,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和鄙视医学,把医生行业,杂列于卜巫之流等陈腐观念,也是一次很好的冲击。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学”和他所推行的“新法”一道失败了。但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在他新政中所表现的政治远见和爱国精神,特别是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献身于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变法斗争精神,却为后人所继承、所发扬。尤其是他的“不以荣辱是非易其下,不以安危利害辞其难”,为实现一时救弊之法而挺身与苟且因循的旧势力斗争的勇气,为后世作出了榜样,赢得历史的尊敬。这是应该肯定的。

作为教育家,王安石全部教育(下转第110页)

然,宋代特别是南宋后期蟠螭纹或龙纹前后腿胫骨部的阴刻短小横线一般也比元代的要多,多的也有达十条以上的,但比之明代还是要少得多,且线条显得粗壮疏朗。

有必要指出的是,此件青玉螭龙带板尽管具有明代初期的一些特点和作风,但也确具有某些元代的遗风,诸如外框琢制呈委角、龙首作侧面表现、龙发上冲、双肩前耸以及秃尾等,尤其是前腿弯屈柔软,后腿一屈一伸,体后部呈爬行的姿态,这是元代螭龙纹的常见形式。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这件青玉螭龙带板的年代,更准确地说,当为元末明初的遗物。

螭纹或螭龙纹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装饰纹样,特别是到两汉及宋以后更是玉雕作品中常见纹饰。螭为龙的一种。《说文》称螭“若龙而黄”,“乃其色黄,状若龙之爬虫”。又说:“一角者天鹿,二角者辟邪,无角者螭。”《广雅》则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总之,螭属龙的一种,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是一种独特的神兽造型,且一般将无角的称之为螭龙。但是,自汉晋以降的史籍中,其称谓就很不统一,以致到当今一般论玉著作中,也同样各有所本,各有各的称法,有的简称

为螭纹,有的不管有角或无角都称为螭龙,还有的因其面部形象似虎而称为螭虎,实际上都是指这种怪异而神武的动物,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动物的造型特征和风格乃至琢制刀法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至今我们看到的玉器上的螭纹,多是汉代定型化后的形象,头部结构比较简单,其面额有的较宽阔,有的呈三角形,体部多作盘曲蜿蜒或攀援匍伏爬行状,对汉以来的这种基本动物造型,泛称之为“螭纹”当无不可,有的因其脸部似虎又称为“螭虎”,以突出其神圣威武的形象,也有一定道理,但有的将此种动物造型概称之为“螭虎”,我看就不一定妥当,就如上面介绍的这件青玉螭龙带饰,尽管体部、四肢和一般“螭虎”的体态基本相近,但其头部面额既非宽阔型,也非三角形,而是作侧面形式表现,且无角,若称之为“螭虎”就与其头部的形象不甚吻合,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名之曰“螭龙”为好。

注释:

①《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册,图199。

②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上接第42页)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反映。他的以“陶冶人才”为中心,以“学用一致”为目标的教育思想,和他在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方面的一整套措施、方法等,构成了王安石的崇实尚用,专而不杂和文武并举为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所反映出“变”、“改”、“用”的唯物辩证因素,为我们研究和探讨教育和教学规律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王安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注释:

①《道德真经集义》。

②《扬龟山先生集学说辨》引《学说》。

③《临川文集》卷68《性说》。

④《临川文集》卷67《性情》。

⑤《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

⑥⑧⑩⑫《宋史记事本末》卷38《学校科举之制》。

⑦《临川文学集》卷24《乞改院条例》。

⑨《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⑪将经文任何一页蒙着,中间只留一行,再用纸贴盖三字,令试者慎之。后来专贴孤章绝句,疑似互参之处,以惑试者。这叫“贴经”。笔试所默诵之经义及其注解叫“墨义”。明经科用口试士者叫“口义”。

⑬《临川文集》卷69《原教》。

⑭⑮《临川文集》卷71《书洪范传后》。